

洪明强

马军巷，又名马军营、军民巷。马军营的故事，在湖州百姓中已流传了800多年，说的是南宋将领韩世忠为防御金兵入侵，曾率军马驻扎在马军巷的狮象弄里（原湖州人武部大院），据清同治《湖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马军巷位于湖城的东部，西起骆驼桥，东至临湖桥，全长约800米，宽3.1米。南宋时期，为防御金兵入侵，韩世忠曾在此屯兵养马，因此得名马军营。明朝以后，马军营改名马军巷。”20世纪上半叶，马军巷又因老骆驼桥堍从高到低的延伸，进入巷子要从南向北绕走铺巷100米左转，才能进入古老的马军巷。外加辅巷，马军巷的总长约900米，南北两侧有13条古弄堂穿插其间。一条古巷，弄堂如此之多，如此之长，这在江南的小城市里是少见的。

拐入马军巷，人行走在青石板上面会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。上世纪70年代初铺筑了沥青路面，巷子两旁以二层楼房居多，也有平房，虽高低不一，但错落有致，是当年湖城最密集的一片古建筑群，亦是湖城面积最大的居民集居区。据1982年版的湖州地名志上记载：“马军巷分马南、马北二个居委会，马南居委会有居民2283人，马北居委会有居民1869人。”一条巷子常住人口有5152人，实属罕见。

马军巷从辅巷至河上~~埭~~为南马军巷，河上~~埭~~至临河桥堍为北马军巷。长长的巷子仅一个拐弯处，古时府衙的官员、大户人家，都集中在拐弯处到河上~~埭~~中段居住，马军巷两旁最经典、最杰出的古建筑群，就集中在这300米上，狮象弄、钱家弄、过渡弄里，务前河南岸的石库门、墙门堂、深宅大院比比皆是。

马军巷转弯角上，原来有个石库门。门框是一座花岗石双开门框，竖在两旁的立柱上都雕刻着花纹，花岗石的门楣中间凿有“好运常来”四个字，其寓意通俗易懂。石梁上的石榫眼，与两旁立柱上的石榫相扣紧密，严丝合缝。两扇斑驳的大门有3厘米厚，各装有一个圆铜的铜环，进门就是一个大天井，花岗石长条石板铺地。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，曾在这个石库门里开过一个粮站，售粮处设在正厅，正厅堂是木地板铺成的，足有100平方米，宽敞、通气。大米存放在楼上，买米的人买多少斤米，钱付好后，营业员朝楼上的营业员喊一声：“蒸谷米30斤！”楼上的营业员过秤后也会喊一声：“好了，请你套上米袋！”几秒钟后，营业员就会将秧桡中的大米，倒入白铁皮漏斗，很快，大米顺着楼上的管道而下，进入了买米顾客的米袋子。80年代中期，粮站迁往了别处。

粮站撤走后，马南居委会随之迁入石库门，厅堂恢复了原貌，厅堂内的木地板仍保存完好，立柱、横梁上雕有各种花卉，楼板平整无松动翘裂的痕迹，留有桐油的光泽，尤显大厅的古朴典雅、气派。大厅南没有一扇落地窗，直通天井，屋檐下，有根雕花的横梁上，留有一个燕子窝。这是一幢典型的清代徽式建筑。居委会在靠北墙边放了只木头长椅，供办事的居民坐着等待、休息。80年代末，居委会凭借着石库门内的大厅堂，和路对面有一口古井的地理优势，每逢星期天，免费为马军巷里的新婚夫妻，提供摆喜酒的场所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马军巷中段有家独门独户的石库门，双开门10厘米高的石门槛，两边都有石樁头，牢牢地嵌入立柱上的石榫眼。门下有二块花岗石台阶，石库门在马军巷的北侧，正门对着钱家弄。古时，在石库门里独家居住，那一定是有钱的商人，或在府衙里谋职的政府官员。1957年，小红出生在这扇石库门里，小红的母亲，在湖州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卖电影票，直至退休。小红回忆，她家的石库门，两旁的立柱、横梁上，是用粗糙的花岗岩垒砌而成，

没有刻字亦没有雕花，进石库门便是一个很大的客厅，客厅中间有一个不通透的屏风，屏风外放了只茶几和一对红木椅。小红的父亲几乎每天坐在红木椅上品茶，或与朋友聊天。站在石库门外看小红家，只能看到茶几和一对红木椅子——这就是我们的先贤，在石库门里面设计之巧妙，布局之合理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小红还说，小时候，母亲退休前经常上夜班，有时，晚上与父亲在一起经常会哭，因家里实在太大了。屏风后有楼梯、有飘窗、有厢房、有厨房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天井，小女孩住在这么大的屋子里，有点惧怕实属正常。

过渡弄沿河的务前河头，有两幢清代留存下来的古苏州式建筑，两幢二层楼房挨得很近，高低一致，两幢楼的石库门都是独户设计，建筑风格也完全相同。所不同的是，东边那幢楼的石库门是用花岗石垒砌，门梁上没有雕刻，简简单单，进石库门便是主人的家。主人姓崔，他父亲是个古董商人（已去世）。80年代末，老崔的儿子继承了爷爷的遗愿，也做起了古玩生意，并开了家古玩店。老崔常风趣地说：“这幢楼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，两扇门常年经风雨的侵蚀，左边门的门板已腐烂，曾换过，右边门的有些门板也换过，可石库门的石门框虽已经



马军巷破损的石库门

风化，但仍很坚固。”步入底层的大厅堂，左边有部木楼梯，沿扶手踏着木楼梯拾级而上至楼上。楼下有厨房间，大天井两边各有一个厢房，天井中间有太湖石构筑的小假山，假山下有个小水池，整幢楼里布局错落有致，构造精美。老崔喜欢在水池里养金鱼，他说这可以激活提升人的精神，让人愉悦。

而西边的石库门门框，石材是武康石，呈淡紫红色，两边的门柱上雕有花纹，门梁上方有个门楣，左侧刻有一条龙，右侧刻有凤，寓意龙飞凤舞、龙凤呈祥。听老崔说，隔壁的主人是一个老太太，已80多岁，老伴早已离世，平时很少出门。石库门虽是她家的正门，可平常很少开门，原来，她家还有一扇边门，在面粉厂弄中段，儿孙们进出喜欢走边门，从马军巷拐入，要近不少路，石库门平时大门紧闭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老崔还说，老太太家的楼房结构、面积，与他家差不多，三开间三进深，但天井比他家还要大，遗憾的是，老崔只是站在弄堂外，朝天井里看过几次，也没进去过。

马军巷拐入过渡弄口，那时有个很小的石库门，门早已不知去向，两扇大门已破烂不堪。进石库门堂，便是一个50平方米的院子，这是陶家居住的地方。以前陶家一直很安静，自弟弟娶了媳妇之后，石库门里有了欢笑声。兄弟两家共走一个楼梯，共用楼上的木栏杆阳台。

马军巷最有名的房子要算那幢红房子洋楼，洋楼高大气派，外墙红砖青砖相间，层次分明。洋楼紧靠马军巷，中间有个石库门，石库门上的门楣，用红砖竖着垒砌成一个半圆形，半圆形红砖正好与门梁吻合。石库门直观感觉很漂亮，既有欧式建筑的味道，又像上海的石库门，里面的天井要超过50平方米，底层都是木地板。新中国建立初期，曾是



马军巷务前河沿岸的老宅

吴兴县委招待所，后又成了老干部之家。回归民居后，居民住多了，楼上楼下的大房间被隔断成二间房，最多时，楼上楼下住了近10户居民。因洋楼已被街道房管会接管，洋楼的原房东是谁，已无人知晓。那些年，洋楼里的居民说话很有底气，有人曾问住在东面楼上的曹阿四：“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曹阿四引以为傲地回答道：“住在马军巷洋楼的石库门里。”邓新平在洋楼里的家，只有三十几个平方米，他常跟别人说：“我家在洋楼的石库门里，房子虽不大，却住得很舒服。”说话的语气，同样引以为傲。这幢洋楼建于20世纪初期，是马军巷里最年轻的一扇石库门。

钱家弄仅一米多宽，早在50

年前还是一条青石板弄。进弄堂15米处，东边有扇石库门，门楣很破旧，上面的字迹已模糊不清，可仔细辨认后还是能看清门楣上的字：“五福院”，寓意五福临门，通俗易懂。这个石库门是徽派建筑，房顶建有一堵高高的封火墙，里面住着7户居民，偌大的天井，被一个个灶披间所占据。篆刻家白先生曾在石库门里居住过，他家的楼房上南北有两排排窗，打开一道道排窗，不仅屋子通风，采光又好，是一栋保存完好的徽派古建筑。原湖州日报社记者，也曾曾在石库门里居住过几年。他家住的是底层，地砖房。石库门的原主人，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个有钱人。那年，钱家弄还是一条无名弄，弄名的由来，与姓钱的原主人息息相关，还有一个民间故事呢。

相传，钱生有一个女儿，长得貌美如花。有一天，钱户主得知，马军巷里有位青年在暗恋他女儿，便托人把那位青年请到家中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要娶我女儿可以，等三年之后，你功成名就时，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你，男人嘛，总要有担当，有所作为，才能养家糊口。”钱户主的一番话，如醍醐灌顶，让这位青年废寝忘食，每天苦读寒窗到天明。三年后，这位青年不仅练出了一手好书法，还考取了榜眼，并迎娶了如花似玉的钱小姐。钱户主言而有信，感动了左邻右舍，他们就把无名弄，叫成了钱家弄。

在钱家弄东隔壁，马军巷122号，也是一扇石库门。石库门没有门楣，但在石库门左右两旁的砖墙里，分别嵌入了一块赵氏堂界碑。进石库门，便是一条幽长的过道，入过道15米左拐，便是一个大院子，院中有一口古井，女人们每天早上在井边洗衣洗菜。院子里共住着5户居民，北面有一栋二层楼房，北面楼上的窗户下是马军巷，2户居民家的门都开在了院子里，用的是同一部楼梯。还有3户居民的家在大院南面。这是一栋很高的楼房，排窗

上有镂空的雕花，屋檐下，分别立有三根粗大的圆木柱子，每个柱子上有个石圆墩作铺垫，木柱子牢固又不易腐烂。楼房顶上，一堵封火墙高出楼顶2米。这栋楼房里，住着一位黄埔军校最后一届的学员，名叫江渭清。他每天的信件很多，墙洞里的邮箱几乎全是他的信件。

沿过道走10米左拐有个小天井，天井边有间平屋，里面住着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奶奶。房子虽破旧了点，房屋结构仍保存完好，古色古香的。天井的西墙上开有一个天井窗，通往“五福院”。再往里走5米是费新发家。他家很小，仅十几平方米，4个人挤在一起，睡觉，吃喝拉撒就在这狭小的内空间完成，实属不易。幸好，在南墙下有个墙壁灶，烧饭时，烟会顺墙壁里的烟囱往外排出。他家门口有2个石门框，南石门框里有2户居民，都是平房，东屋是居加敏家，地板房，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左右。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，算是很宽敞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采光差了点。西屋与东屋面积、地板、采光基本相同，住着一个刚搬来的小伙子。屋外有个几平方米的小天井，花岗条石铺地，两边各有一只窰井，每逢下雨时，屋檐上的雨水向天井的石板上倾泻而下，神奇的是，窰井眼只要不堵塞，石板上就不会积水，窰井里的水究竟通往何处？是个谜。东面的石门框是通向里屋的过道门。住石库门里的陈老伯曾说：“以前，这两扇过道石门框上有门，关上门，住户们各不干扰，这叫石库门里的套门。只有府衙官员、大户人家才这么设计的。”

走进过道，里面又是一个大天井，天井边有一口古井，井沿口下有“饮水思源”4个字。古井两边各有一间厢房，南面的楼房更大气，排窗上有镂空的雕刻，上下用房木板一间间隔开。楼上住着方李平兄弟2家。楼上西屋是老房东留下的，房东名叫赵子松（拆迁公布名单上看到的，已故），是大清光绪年间湖州府衙官员，20世纪初期就去了上海，西屋一直空着。楼下西屋住着王发根家，东屋住着高连宝家，东西屋都是落地长窗。最里的屋是曹政和与笔者家。里屋还有一个大天井，天井上方有一堵5米高的封火墙，厢房门洞里藏一个很粗的门闩，门闩拉出，门就关上了。整扇石库门里共有5个天井，2口古井，进深超过50米，这在湖城是绝无仅有的。马军巷拆迁时，房东的后裔站在楼前说的一番话，至今仍让笔者回味：“湖州是一座小城，在石库门里建造那么好的楼房，阿拉太爷爷真了不起！”

马军巷拆掉已31年，一扇扇石库门，一堵堵封火墙，一块块红砖黑瓦，那镂空雕花的窗子，墙壁里的烟囱，神奇的窰井，在岁月的流淌中，流入了湖城的记忆里！

（图片来源：《湖城旧影》）



马军巷中段的独户双开石库门

孤岛时期的刘承干与沈淇泉

蔡圣昌

1945年7月16日下午，上海海格路（即今华山路）中国殡仪馆内，举行一场追悼会，逝者为沪上名流、书法界称其“翰苑巨擘”沈淇泉。吊唁者有金兆蕃、张菊生（张元济）、叶扶霄、沈慈护（沈曾植儿子）、朱象甫、余节高、吴东迈（吴昌硕三子）、沈希白、杨翰西、严载如、沈希平、卢少棠、徐万里、程仰坡、陈子康、李如登、严孟繁、沈礼威、钱自严、王念亲、刘承干等。

沈淇泉，名卫，字友霍，又字淇泉，号兼巢老人、四红豆馆主。1862年生。浙江嘉兴人。光绪进士，散馆授编修。任甘肃主考官、陕甘学政。

郑逸梅《世说人语——南通状元张季直》一文载关于沈淇泉跟张謇争状元之事，读后令人唏嘘，因文字较长，现摘录部分内容：“科场情况，很为复杂，争奇竞逐，也就有幸有不幸了。所谓不幸的是沈淇泉，幸的便是张季直。……沈淇泉于清光绪己丑恩科。受知于顺德李芳农、衡山陈伯南，始膺乡荐，庚寅二月，北上应保和殿复试……因其时维新人士提倡筑铁路，而顽固派反对甚力，该卷大为汉军徐荫轩所赏识，置诸第一，且进程光绪，亦领首称善，一时朝贵争相延誉。不料，在此紧要关头，淇泉忽得母病急电，即仓促南下，三年丧服满，再度入都，先补贡士，复试列一等，继补殿试。这时，衡文阅卷的大臣，都喜欢培植自己的得意门生，借此夸耀。黄慎之颇思提拔淇泉，可是翁同和却拟擢拔张季直，于是季直成为淇泉敌手。……翁同和力诋淇泉卷，盛誉季直。张之万却不赞成，认为季直卷字迹干枯，无福泽，其人必老迈，不宜为多士之魁。翁乃商诸汪柳门，汪谓，沈淇泉了母丧，是庚寅补殿试的，如庚寅得状元，那么新科没有龙头了，不妥，不妥。并且把理由直陈张之万，最后便决定取季直卷为第一，以淇泉补殿试故，抑之又抑……”

翁同和曾任同治老师，后又任光绪老师，称两代帝师，权势显赫。他是江苏常熟人，跟张謇属同乡。张謇的政治观点跟光绪相近。因此翁同和帮助张謇合情合理。

中国古代官场历来讲究孝道，凡事以孝为先。沈淇泉因为母丧回家守孝，耽误了殿试。三年后重赴殿试，因此有了不同的结局。原本有希望得到的状元也因此失去。

张謇（字季直）跟沈淇泉是同科进士，还有一个人也在这场科举中得了进士，那就是南浔刘锦藻。刘锦藻是湖州南浔丝商刘镛二公子。刘镛从做生丝生意起步，到经营盐业，开当铺，到刘锦藻考取功名的时候，刘家的财产已经达到了二千万两银子，荣登南浔“四象”之首。刘锦藻跟张謇相识很早，刘家在江苏南通等地开设当铺，经营盐业，刘镛的女婿蒋锡绅中举后曾经去南通帮助岳父管理盐业，从而结识张謇，二人成为好友，之后两家结为儿女亲家。后刘锦藻考取举人，蒋锡绅和张謇、刘锦藻三人在1890年一同从通州乘船到京城参加会试。张謇荣登状元后“弃文经商”，1898年应张之洞之命回南通发展实业。刘锦藻动员浙江商人参加他的实业投资。

张謇1926年病故，年74岁，刘锦藻1934年病故，年73岁。沈淇泉跟刘锦藻同年生，但他却长寿。当张謇跟刘锦藻都相继去世以后，刘锦藻的长子刘承干继承了刘家的大部分财产，淇泉因是父亲的同年，刘承干跟沈淇泉成了忘年交。

据刘承干《求恕斋日记》记载，辛亥革命以后，沈淇泉在沪上做寓公，以鬻字为生，生活贫困。刘承干则跟沈淇泉交往很多，经常给以帮助。如1938年1月14日记载：“至沈淇泉处，知其近况甚窘，赠以百元，为卒岁之资。”

日本人占领上海，租界成了孤岛，躲在租界的遗老族得到暂时的快乐。他们大多年事已高，不问政治，只图生活安谧。刘承干因为是沪上富绅，经常召集遗老聚餐，有时候还互相阅古籍古画。聚会几次以后，遗老们感觉到每一次聚会总叫刘承干会钞不好意思，他们提出一个值会叙餐的办法，类似于今天的自助餐。

从刘承干《求恕斋日记》里记载，“自助餐”从1938年7月开始一直到1941年12月止。

1938年7月18日，晚至山景园应冒鹤亭之招，叙餐也，每人两元。到者喻志超、叶柏棣、沈淇泉、夏剑丞、严载如。（《求恕斋日记》）

这是第一次聚餐的纪录，一共有七位。冒鹤亭，即冒广生，光绪二十年举人；喻志超即喻长霖，浙江台州人，光绪二十一年榜眼；叶柏棣即叶尔恺，杭州人，光绪十八年进士；夏剑丞即夏伯严，号散原，光绪十五年进士。严载如出生较晚，他没有赶上

科举，但他是一位著名诗人，且爱好收藏。每次聚会的人员相对固定，且以遗老为主，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兴趣都基本相同。后来又有新人加入，最多时达到十三人。

如1939年4月22日记载叙餐情况：“钱自严值会，聚餐共九人，淇泉、柏棣、虞琴、鹤亭、荫梧、学川、载如。”

钱自严，即钱崇威，字自严（1870——1969），江苏吴江人，光绪进士、翰林，曾任江苏高等检察所检察长。后因病辞职。姚虞琴（1867——1961），浙江余杭人，以书画驰名沪上。葛荫梧即平湖葛昌楣（1886——1964），南社社员，工书法，富收藏。程学川，嘉兴海盐人，光绪进士，翰林院编修。以后参加叙餐的还有林子有，即林葆恒（1872——1950），为林则徐侄孙，精于词学。此外还有陈蒙庵、陈子康、吴养臣等。

叙餐的地点也不固定，有时在饭店，有时则在自己家，有时则假借别人家。如1939年12月20日记载：“至严载如处聚餐，由沈淇泉值会，假座载如处，借林子有厨房，价30元，尚好，每人派四元。”

多数时间是借用刘承干家聚会，因为刘家宽敞，而从未在沈淇泉家里聚餐。这或许是因为他的住房条件有限。厨司也是临时借来的，菜肴则由厨司采购，然后平均分摊。

值会聚餐每个月只有一次，而刘承干的社交活动则非常频繁，因此刘承干也会经常邀请沈老参加他举办的其他活动。比如，1939年3月25日溥西园来上海，溥西园是乾隆皇帝的玄孙，人称“侗五爷”。此人是有名的京剧票友，对昆曲、京剧、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以及各种演奏器具都非常精通，他还喜爱收藏，对这样一位玩家刘承干自然要殷勤款待。据那天的《求恕斋日记》记载，刘承干在家中大厅里设宴招待溥西园，参加的人员有张蟹庐、叶柏棣、沈淇泉、陈徵明、叶浦荪、缪子彬、褚礼家、袁帅南。

刘承干宴请一批丝商朋友和商界好友也会邀请沈老参加。如1938年9月25日《求恕斋日记》载：“午刻起身，一时，金兆蕃、张养初、褚礼家、沈联芳、施省之、庞莱臣来茗谈一小时，淇泉尚未至，乃先入席，推之再三，无人肯坐首，待至淇泉坐，省之次之，兆蕃、莱臣又次之，余则随便乱坐。省之以三时有事，鱼翅上后即走。淇泉来，不肯坐首座，即坐省之次座。散后客即去。”

沈联芳和庞莱臣都是湖州著名丝商，施省之是银行行长。

沈淇泉是刘锦藻同年，对刘承干来讲沈是长辈，因此刘承干对沈非常尊重。那段时间，沈老年事已高，行动也有些不便。而刘承干外出一一般都是乘汽车，或者是坐黄包车，因此刘承干会经常来沈淇泉家里带上他一同外出。

1938年11月，沪上名士王一亭离世，沈淇泉跟一批文友们相聚要给他一个谥号，刘承干也应邀参加。那天跟刘承干同席的有叶柏棣、沈淇泉、张菊生、朱琇甫、程学川等。1939年初，刘承干跟沈淇泉同至佛教净业社吊唁，完后又带着沈淇泉同至大新公司看中国历代画展，那天的日记写道：“人太拥挤，不能细看，略观大略而已。遇金兆蕃通尹父子。觉腹中饥，至楼下吃点心，欲入袋取款，则马褂袋中皮夹已遗失，方知在书画会场中为剪络贼窃，幸无要物，只两元法币而。遇方慎庵（合肥人，金针医生），与淇泉甚熟，点心钱一元二角由慎庵帐出。”

那天后，刘承干又带着先考（刘安澜）和本生考（刘锦藻）的遗像来到沈淇泉家中，乞求沈老为遗像题字。沈老欣然答应。题字完后，刘承干支付润笔费一百元。沈淇泉推辞再三勉强接受。

沈淇泉跟南浔丝商庞莱臣也是好友，1940年7月26日庞莱臣生日，刘承干便约了沈老同去祝贺。那天日记写道：“五时后至淇泉处，与之同至莱臣处，今日生日也（今年是重游泮水，故送对联立轴，寿礼则向不送也。）”

1941年沈淇泉八十八寿辰，那年也是湖州丝商张云搏七十岁，刘承干六十岁。刘承干便约三人共同庆祝生日。《求恕斋日记》记载：“云搏31日，至庞莱臣处，为淇泉、张云搏余三人预祝。八十、七十、六十。”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人侵占租界，他们疯狂地掠夺物资，导致物价飞涨，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像刘承干这样的富绅也已经自顾不暇，因此遗老的聚餐活动就无法再继续了。

